

Anthony Giddens
and Christopher Pierson

现代性



—吉登斯访谈录

[英] 安东尼·吉登斯 克里斯多弗·皮尔森 著
尹宏毅 译

**Making Sense
of Modernity**

*Conversations with
Anthony Giddens*

新华出版社

Anthony Giddens
and Christopher Pierson

现代性

——吉登斯访谈录

**Making Sense
of Modernity**

[英] 安东尼·吉登斯 克里斯多弗·皮尔森 著

尹宏毅 译 *Conversations with
Anthony Giddens*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性: 吉登斯访谈录 / (英) 吉登斯, (英) 皮尔森著; 尹宏毅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0.11

ISBN 7-5011-4826-0

I. 现… II. ①吉…②皮…③尹… III. 现代化-哲学理论
IV. 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7248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备字 01-1999-184 号

Conversations with Anthony Giddens: Making Sense of Modernity
Copyright © 1998 by Anthony Giddens and Christopher Pierso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1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imited
中文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现 代 性

——吉登斯访谈录

(英) 安东尼·吉登斯 克里斯多弗·皮尔森 著
尹宏毅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插页 2 张 14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826-0/D·771 定价: 15.80 元

前 言

正如马丁·奥布赖恩的介绍性文章所阐明，安东尼·吉登斯在社会科学方面堪称大家。在四分之一一个世纪里，他笔耕不辍，现已跻身于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和被最广泛地引用的社会理论家行列之中。他的兴趣多种多样，从欧洲大陆哲学的最艰涩内容，到自助手册的医疗术语他都涉猎；他研究成果的基础，是他对社会科学范畴和超出这一领域的各种著作的以批判态度的广泛涉猎。在他的帮助下，一整套新的词汇应运而生，运用这些词，我们能够领略生活在瞬息万变的现代世界中都意味着什么：构成理论、实际意识、时空距离的概念、人为制造的风险、生活政治学等等。此外，吉登斯还不辞辛苦地与他人共同创建了自己的出版社，领导了剑桥大学新的社会和政治科学教研室，而且仍然充当着他心爱的“马刺”足球队未能再创他在伦敦北部年轻时代辉煌业绩的败落的见证人。

1997年，吉登斯接受了出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这

TKG/7

一重大挑战。吉登斯对该学院应充当的特殊角色是有明确主见的。该学院一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现实世界中的政治生活和决策工作，在系统性改革的时期尤为如此。近年来，吉登斯越来越对主流政治领域显示出浓厚兴趣，并参与其中。一到伦敦经济学院上任，他就立即着手缔造日后将造就该学院与政治实践的广泛领域之间“特殊关系”的纽带。这位激进主义的新院长上任后不久，在不算长的时间里在第一届中间偏左派政府中竟然当选，从而迎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吉登斯对“激进的中心”和“超越右翼和左翼范畴的”“第三条道路”重要性的笃信不疑，使他跻身新工党权力结构的最高层，成为其中一位很受欢迎和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构成本书大部分的这些访谈都是在吉登斯出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后几个月之内，乘着新工党1997年5月1日成功的兴致而进行的。采访的内容试图囊括从70年代初他研究“古典”社会学大师时起，到他关于处于“反射性现代特征”影响下的世界政治性质的思想的全部脉络。语言的风格是侃侃而谈，技术性术语被尽量减少。我试图提出的问题是任何感兴趣的读者都有可能提出的，任凭吉登斯以他自己的、干脆利落的独特声音来回答。

吉登斯仍然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批评他的人们一口咬定，他的著作不仅范围广泛和多种多样，而且肤浅和五花八门。他们争论说，他从不在一个问题上逗留足

前 言

够长的时间，使人们要么能够捕捉到他的形影，要么能够确定（在他们看来）基本上尚属未经充分证明的猜想的真实性。但是，就连最激烈地批评他的人们也会发现，吉登斯的著作因其挑战性的思想和撩人的看法而富于活力，这一点很难否认。其他的人们则将会乐于欣赏和领略这位知识分子的绝技。

克里斯多弗·皮尔森

1998年3月于诺丁汉

导论：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学

马丁·奥布赖恩

安东尼·吉登斯是战后时期英国主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著作囊括了 30 多年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并且一直处于 80 年代和 90 年代社会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前沿。他对经典社会学传统的诠释 20 年来一直是（而且仍然是）社会学理论方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内容的中流砥柱；对社会学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他那富于想象力的重新论述，对于学术辩论和知识争论的促进作用与此等量齐观。他是一位划时代的社会学理论家、出版界的独行侠和影响越来越大的政治哲学家。现在，在从 70 年代以来的第一届工党政府上台后的这个捉摸不定的时期里，他又承担起了一项职业上的挑战，即领导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在向新读者介绍吉登斯博大精深的思想方面，我将提纲挈领，而不是面面俱到。我将着重介绍他的多样著作的不同方面，以提供对他的理论和哲学思想的概览。通过这一方式，我希望大家既认识到他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又了解到他对社会学的改造所提

出的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勾勒出他的研究成果主要轮廓之前，我首先评论一下吉登斯对社会学这一学科的理解。

社会学任重道远

据吉登斯说，社会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与自然科学家不同，社会学家所寻求了解的世界已经为世人所了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人们的所说和所做、他们的信仰和欲望、他们如何构建机构和制度，以及他们如何互动——与自然科学，比如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人们的行动和互动、他们的信仰和欲望，乃是社会学家所研究世界的一个核心特色。此外，这个世界不可被缩减为单独一套“正确的”涵义或解释体系。社会学的世界包罗万象，其特征是相互竞争的、有时还是相互矛盾的涵义和理解框架及信仰格局。当物理学家相互争论宇宙是否（以及为什么）正在扩展的时候，他们所争辩的是能量和物质之间基本物理关系的单一的、独一无二的原因和性质。当社会学家彼此争论社会是否（和为什么）依据阶级、性别、民族或个性关系而划分的时候，他们所争辩的是社会经历和行动的不同层次之间复杂的相互交叉。对这些社会力量当中的每一种，社会学家都必须提出不同的解释，因为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并没有独一无二的原因和特性。

再举一例，一位化学家，在寻求了解水的特性过程中，不必纳闷一些氢原子是否打算与一些氧原子结合，以生成一个水池、湖泊或海洋。就更甭说对不同的氢原子来说，同氧原子聚集起来形成水意味着什么。而一位社会学家所面临的问题则恰恰是，人们做事是有动机和目的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自己所做的事情，他们的行动和互动的涵义对他们自己来说是昭然若揭的。氢原子和氧原子并不打算生成湖泊或海洋，而人们则明确地打算结婚或离婚，住在城市或乡村，当工薪阶层或雇佣他人来为自己干活。虽然一些人结婚或上班可能是无可奈何的，但是他们结婚或上班却不可能是无意的。因此，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学必须寻求了解人们的意图和目的与他们在其中生活的社会领域之间的关系。

然而，使社会学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一个事实，即社会学家属于他们所研究的世界：他们采用同样的日常习惯来处理自己的生活，他们与之共同进行有意义的行动和互动的人们以及机构与制度就是他们的研究对象。社会学家的社会存在，包括社会学家对自己研究对象的了解，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所处社会领域的中介作用的影响。在解释这个世界过程中，社会学家必须利用造就这个世界的常理性的理解和在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信念和涵义。我在前面的例子中所举的化学家不会、也无法参考氢原子对自己的实际存在的解释，而社会学家则

必须参照人们对自己的社会存在的一般解释。社会学家首先是他所研究的世界的普通一员。像这个世界中每一位其他个人的解释一样，他所提供的解释也是这个世界基本特性的部分内容。

因此，社会学家的任务——即解释社会如何运行，抑或一个社会如何和为什么以一种形式而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组成——乍一看来似乎是对我们大家对自己解释世界的一般说法的转述或者注释。毕竟，如果人们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和为什么做，起码在大多数时候，如果他们知道和了解自己日常的习惯性活动的原因和后果，则社会学家的解释就仅仅是对解释世界的可能的说法总数的添加而已，其洞察力、严谨性或准确性与任何别的解释都不相上下。这样一来，社会学家都做了些什么，导致有人怀疑职业社会学家对世界的解释到底有无价值？

吉登斯的回答是，社会学起到“双重的解释作用”：它既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知识，又回到这种知识中去。它的命运是注定要与人们解释世界的常理性说法纠缠不清。吉登斯说，在社会学中得到大力发展的概念和想法——像“社会地位”、宗教和政治领导人的“领导魅力”，或者“道德恐慌”等——如今在媒体和人们的日常讨论中普遍使用。社会学对离婚率、健康和疾病的分布、收入和生活方式、媒体的效应、家庭构成的状况等等许多问题的研究成果现在是地方和全国政府政策制订工作的核心支柱。社会学知识注定会成为“大家共同的

知识”，因为社会学知识就是现代社会的成员们理解和解释这个社会运行规律的主要手段之一。社会学知识所涉及、融入和帮助改造的世界，正是它所寻求解释和分析的世界（见吉登斯，1996年）。因此，社会学这项事业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它运用社会上的人们所共享的一般涵义，但将其加以改造和扩展，以促进积极的社会变革进程。它是对吉登斯所说的社会反射能力（我在下面将对此详加解释）的有意识的利用。这种能力就是对有关社会的知识的反射性应用，以应付社会中新的情况和条件的挑战。如此表述，则这个想法看来具有诱人的简单性。但是，它在吉登斯著作中的出现和它在整个职业社会学界的传播却经过了一场漫长而艰苦的远征，经历了在经典和当代社会学思想丛林中的披荆斩棘。

对经典著作的清算

吉登斯于60年代末开始就经典社会学理论问题著书立说。那时，在该学科对经典理论家（特别是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著作的理解方面，独占鳌头的是美国传统，尤其是帕森斯的著作。这一传统不仅在诠释经典著作方面居于主导地位，而且在确定经典理论应该如何应用在偏常者行为、健康和疾病、大众媒体效应或消除社会隔阂等实际问题方面，往往也是举足轻重的。60年代，吉登斯同时解决了这两种倾向。关于第一种倾

向，他重新考虑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和西梅尔的社会学。关于第二种倾向，他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重新考虑有关自杀问题的社会学。从一定程度上讲，选择这个问题作为探索社会学理论的工具是有重大意义的，它引导吉登斯有条不紊地重新估价了涂尔干的研究成果。涂尔干于1897年对自杀问题的研究标志着旨在把社会学这一新学科塑造成关于社会的一门积极、客观的科学的努力。它的重要性还在于，正如涂尔干所认识到的那样，对自杀问题的研究揭示了社会学研究的一项根本性的理论任务。这项任务就是揭露出，一门研究社会力量、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社会科学如何才能弄清一种按照常理似乎具有很强的个人性和隐私性的事件。自杀问题重要性的第三项意义在于，在研究这一论题过程中，吉登斯被迫面对社会学界的一种带有根本性的分歧，即对一个共同问题的两种势不两立的和相互排斥的研究方法——“实证主义”方法和“现象论”方法。它们标志着占据二战后学术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学（见达维，1970年）。

简而言之，实证主义的做法依据涂尔干的方法和指导，试图显示自杀率和各种外部因素，譬如城市生活的孤独（塞恩斯伯里，1955年），之间的客观相互关系。而现象论的做法则依据胡塞尔的哲学，考察一起死亡事件如何被赋予“自杀”这一主观涵义，是在什么情况下赋予的，以及这样做的后果如何。虽然实证主义观点接

受官方的自杀率数据，认为其基本上为这一社会现实情况勾勒了一幅准确的图画，但是现象论观点则给这种认识挖了墙角，通过表明，文化和亚文化因素影响下特定的死亡是否会被归类为自杀，不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地这样做（见道格拉斯，1967年）。就自杀问题而论，“两种社会学”的分歧可以用两个截然相反的问题来概括：社会学上的自杀概念仅仅相当于验尸官等官员的官方记录吗？换言之，社会学的任务是不是探索人们在何种文化和亚文化情况下认识死亡和对其赋予个人的关注，将其当作自杀事件？

尽管吉登斯在这一难题上煞费苦心，但是他在社会学理论方面就自杀这一具体问题上的做法并未被社会科学界所普遍采纳，其部分原因是，对自杀问题的分析从社会学的探讨议程上消失了。但是，他因此而接触到的种种问题却一直在他的著作中得到反复的探讨。从70年代初开始，自杀问题开始从吉登斯自己的理论议程上消失，他转而研究起自己在与这一问题遭遇的过程中所引发的一些范围广泛的理论问题。特别在使涂尔干思想的实证主义特色同胡塞尔哲学的现象论特点相交织方面，他下了不少功夫。尽管他并不是明确地这样做，但是这种努力成为他在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初著作的特点。

1971年，吉登斯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一书出版。该书在大约10年里一直是他最著名的著作。

这本书迄今仍然是了解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思想的最宝贵来源之一。鉴于从那时以来，同样论题的著作层出不穷，所以这一点尤其值得一提。该书标志着吉登斯对社会学理论不同的复杂层次的广泛评估的开始。吉登斯至今仍在从事这项工作。1972年，两部相互关联的书出版了。一本是由他编辑的涂尔干的文集（吉登斯，1972a）；另一本是关于韦伯的社会和政治著作的一个很短的畅想录（吉登斯，1972b）。次年出版了《先进社会的阶级结构》（吉登斯，1973）。1974年出版了由他编辑的有关实证主义和社会学的文集（吉登斯，1974）和一个有关英国社会精英阶层的文集（吉登斯和斯坦沃思，1974）。在这一时期，吉登斯还始终忙于为专业报刊撰写文章。1977年，一本以《社会和政治理论研究》为题的论文集发表（吉登斯，1977）。这些论文扩展了吉登斯对社会学经典著作的评论范围，并且涉及了社会科学领域中另外一些重要的和新兴的领域，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于尔根·哈伯马斯的批判理论，以及哈罗德·加芬克尔的民族方法论。在这个时期，吉登斯通过思考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基础，他后来的著作将要提出一个新的社会学范式，即“构造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关于这一理论的轮廓，《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书作出了尝试性的论述（吉登斯，1976）。 帕森斯

该书的主题由于几个原因而具有指导意义。像吉登

斯从前对社会学中自杀问题的关注一样，这本 1976 年出版的书重新唤起了人们对涂尔干在当代社会学中地位的重视。1895 年，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对社会学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发表了论述。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学是一门系统性的、严谨的、来自经验的科学，它把世界当作客观数据的一个来源来对待，认为社会学与自然科学相当，不受世人的主观信念和意图影响。与此形成对照，在吉登斯看来，在 20 世纪下半叶重新考虑社会学观点，就必须把主观因素纳入到社会学体系之中，尽管其方式是涂尔干所未曾预见到的。简单地讲，在吉登斯看来，社会学应当认为，世界对世人来说是有涵义和个人意义的，世人的意图以某种方式得到反映，这种对社会学的认知具有极端重要性。否则，这一学科就不能解释每一个人如何对社会集体的历史做出贡献，帮助塑造这一历史。《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既是对涂尔干社会学重要性的认可，又是对涂尔干传统的清算。虽然该书的重点是批判诠释性的（或者不严格地讲是现象主义的）社会学，但是它还是有意识地承认必须超越涂尔干。该书出版后，吉登斯社会学也就翻开了新的篇章。他的新范式，即构造理论，3 年后在《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一书中第一次得到系统性的介绍（吉登斯，1979）。

构造理论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我花了一些时间专门研究吉登斯同涂尔干社会学的关系，因为这一关系对吉登斯理论，抑或对任何拟议中的对该学科的改造，都具有核心意义。这并不是说，其他经典社会学家，特别是马克思和韦伯，在吉登斯的著作中无关紧要，他们一直都很重要。但是，在构造理论中，涂尔干发挥了最重要的经典影响，因为他的遗产导致吉登斯采取了对“社会结构”的高度形式化和抽象的构思。例如，马克思往往十分生动和形象地详细描写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工厂、贫民窟和拥挤的住房、生产工具、资产阶级的脑满肠肥、无产阶级不可避免的贫困化和沦落、工人阶级运动和政党的形成等等。而涂尔干则间接地描述社会结构，将其比做生物的细胞和器官。社会结构是通过“社会纽带”的粘合作用而维持的；这种纽带对社会学家来说仅仅是抽象地显现，形成与社会融合的具有一定稳定性和有序性的格局。吉登斯采取了一种与此相当的形式主义做法；他争论说，“结构”概念本身对社会学来说是毫无用处的，社会学家应当谈论的是社会融合的“构成性”，以此作为人们实现其目的和目标的媒介。

如果社会学要把世界理解为既对其成员有意义，又

起码是部分地由他们所复制和改造，那么人们对这个世界的任何社会学描述，正如吉登斯所争论的那样，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学。关于社会学的知识和理解并不是职业社会学家所独有的特权。人们的习惯性行为揭示并表达了社会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例如，交谈的规则、对行为的期望，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亲密礼节，都扎根于这样一些知识：社会生活是怎样和为什么发生的：谁说话或者谁沉默以及何时说话或沉默，谁站立或坐着，以及为什么坐或立，谁属于或不属于，以及属于或不属于什么，谁受到尊敬或厌恶以及何以如此，这些都是日常社会学的普通构成要素。有关社会领域如何运作的知识（不论其看来可能具有多大局限性或分散性）扎根于生生不息的人们的日常行动与互动之中。它所形成的是“实用社会学”。人们运用这种社会学知识通常是在没有有意识到它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有关世界运行规律的知识很像语言的使用规则。对一种语言运用自如的人们能够运用语法规则来相互沟通，但他们并不必使自己的语法知识成为自己所讲内容的一个明确特征。实际上，如果说者和听者每次沟通情况时都不得不确立语法规则，则他们能沟通的情况就寥寥无几了。在运用语法来沟通自己想要沟通的信息过程中，讲话者便在无意中复制这些语法规则。当我说话时，我的意图是表达一个意思，为了使我的话听起来更合乎情理，更有说服力或更加悦耳等等，我可能会利用某些语法规则。然而，